

整体史观视域下辛亥革命与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的逻辑*

张宗兰^{1,2} 梁大伟¹

(1.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2.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不懈奋斗的目标。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根本政治前提。整体史观视域下考察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深远影响, 蕴含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的逻辑。短时段下辛亥革命为现代国家建构开辟了方式、孕育了支撑性主体、奠定了社会基础, 回应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主题; 中时段下辛亥革命开辟了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成为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主体, 汲取辛亥革命经验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构; 长时段下中国共产党汲取孙中山的思想资源, 将国家主权的维护、统一的政治制度建设、统一的文化认同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 开创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新格局。整体史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汲取辛亥革命历史资源的过程, 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互为表里的内在逻辑统一, 对于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整体史观 辛亥革命 现代国家 国家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2-0139-10

地理大发现以来, 人类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是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但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实现都必须以现代国家的建立为政治前提。实现国家统一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但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 建构一个主权独立、界限清晰、中央集权、政治民主的现代国家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前提和唯一出路。在中国现代化国家形态演进历程中, “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它“终结了王朝国家演进的历史进程”^{[1](P174)}, 开启了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新征程, 辛亥革命后“政党建国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流国家形式”^[2],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1](P174)}, “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3]。上述研究为本文考察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发展具有承上启下作用, 而学界从整体史观视角探究这一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少。整体史观深受法国

收稿日期: 2025-04-29; 修回日期: 2026-01-08

*基金项目: 2022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建构研究”(HB22DD010)

作者简介: 张宗兰, 博士研究生、讲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梁大伟,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的影响,指对某一历史事件作三个时段的考察,“长时段是逻辑性,中时段是必然性,短时段是偶然性”^{[4](P43)}。从黄仁宇“大历史”^[5]到李金铮提倡的“三位一体”整体史^[6]研究,整体史观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以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融入对历史事件的透析。整体史观视域下考察中国共产党汲取辛亥革命历史资源的过程,可探知建构、巩固和发展现代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其中的主题。具言之,短时段下辛亥革命的发生回应了近代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主题,中时段下辛亥革命开辟了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路径,长时段下中国共产党发扬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汲取孙中山思想资源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格局。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构互持,蕴含着以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为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里的内在统一逻辑。系统回溯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对于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短时段下辛亥革命回应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主题

现代国家^①作为“现代性的产物”^{[7](P192)}率先兴起于西欧,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强大的政权组织力。而其他国家,要么迅速地演变为民族国家,要么继续维持原先的国家形态而徘徊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之外,甚至沦为民族国家的殖民地。^{[11](P7)}在此演变规律下,中国

为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境遇,建构起一个现代国家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剧的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意在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主政治取代皇权专制的制度嬗变,以求得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往往质疑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否必要,革命是否应让位于改良,武昌首义的偶发性是否是革命规律的呈现,以此否定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达到对现实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否定”^[8]。因此,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整体史观视域下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影响进行解读,可以更加深刻体察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结果。

首先,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根本目标。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始终在回应一个主题,即“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9](P2)}?近代中国人在一次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惨痛思悟与探索中,把“自强”和“求富”理解为现代化目标,渐进认识到“追寻富强对捍卫主权具有重要意义”^{[10](P5)},建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才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屹立不倒。为此,孙中山先生以改革求富强的希望破灭后转向革命,但他始终认为革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方式,而“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他在海外华侨中募资时承诺华侨“建立一个值得人人之为之骄傲的、光荣的、现代化的中国”^{[11](P50)},“要求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实现现代化”^{[11](P84)}。历史已经表明,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对中国政治、经济、

①又称民族国家,吉登斯所指的民族国家是以西欧为典型的一族一国为特征的原生态的民族国家,参见[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周平认为,民族国家并不是仅仅指单一民族国家,将其和多民族国家对立起来是一种误解。民族国家是西欧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取代王朝国家的一个阶段,多民族国家是从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角度来区分的国家类型。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这里的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政治民族。具体参见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7-28。本文认同周平的观点,当代中国从国家形态来看是民族国家,从民族构成来看是多民族国家,即建立在中华民族构成的“国族”认同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思想文化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进步意义,这些措施推动着贫弱的中国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其次,晚清政府无法转型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主体。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晚清政府作为中国既有政治力量,虽然历经三次内部改革但都没能顺利转化为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主体,封建地主阶级不能完成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封建官僚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因技术变革在先,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性变革缺位,在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维新变法运动因帝后权力格局博弈致使最高领导核心分裂,改革举措剧烈失当超越了社会承载能力,最终变法仅仅维持了百日之余。时人曾对晚清政府最后一次改革——清末“新政”寄予厚望,认为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新政”能够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辛亥革命的发生扰乱了清政府的改革进程。但事实上,清政府的“新政”举措之一“皇族内阁”出场,“立宪”派认识到满清贵族不肯与汉族地主分享权力,逐渐对清政府离心离德,加速了晚清统治的土崩瓦解。一系列新政举措意在引领晚清政府转危为机,不想却走向统治的反面,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和自身的掘墓人。诚如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波旁王朝的改革,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实行改革的时刻”^{[12](P6)}。晚清政府政治专制腐败,经济软弱无能,对内不能自强,对外不能御侮,注定不能在一个虚腐的封建体制上建构起一个主权独立进而富强的现代国家。

第三,暴力革命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方式。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部现代国家建构、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近代中国虽然理论上享有建构现代国家的权力,但工业革命“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P36)},中国在殖民主义的炮火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丧失了自由发展和建构现代国家的可能。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不希望看到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

本国封建势力也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和平改革的道路无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而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革命逻辑,即必须以革命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结束国内各民族间的松散局面,最大程度地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普遍认同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4],在中华民族“国族”认同基础上,走上先谋求民族独立而后实现国家发展的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之路。

在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情势下,武昌起义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成为历史主题背景下的必然事件。不可否认,清政府调遣武汉三镇驻军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以致武汉等地驻防空虚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条件,表面看来武昌起义确实有偶发性的特征,历史虚无主义也试图以此来否定革命形势即将到来这一客观规律性。但就整体形势而言,革命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而非有无的问题。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外部环境来看,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使得中国丧失了通过自我改革建构现代国家的机遇,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成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题中之义和必要前提,革命为建构现代国家之唯一根本出路。对此,毛泽东在回击美国学者艾奇逊对中国革命原因的歪曲时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15](P1513)}。从统治危机来看,在晚清最后10年间,抗捐抗税、饥民暴动、罢工与罢市、秘密会社起事等各类民变无时无处不有。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16](P3-4)}内忧外患下的晚清统治危机中蕴藏着革命因素,如此反复出现的民变表明客观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如毛泽东所言,“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17](P105)}。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即使没有武昌首义,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也会在下一次人民起义中覆亡。武昌起义是革命必然规律中的偶发性事件,也是中国现代国家

建构必然以革命面貌呈现的反映。

综观之,工业革命后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成为必然趋势,近代中国为避免沦为殖民地厄运亟须建构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但晚清政府因其腐朽衰弱无法转化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支撑性主体,随着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逐渐成熟,呈现出以革命方式建构现代国家的可能。中华民国成立后,共和制政体、责任内阁架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及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推行,共同勾勒出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演进的图景。需要指出的是,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是在多民族为主体的国族认同基础上构建起现代国家。如学者指出,“武昌起义后,‘五族共和’成了时人的基本共识,成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18]。虽然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完成相距甚远,但毕竟为现代国家建构开辟了方式、孕育了支撑性主体、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华民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家成长开始全面从传统的历史逻辑向现代的历史逻辑转换,即告别帝国体系,走向现代国家建设。^{[19](P29)}

二、现实逻辑:中时段下辛亥革命开辟了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路径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未完成”状态延展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空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面临两大危机,一是主权危机,二是政权危机。^{[19](P51-52)}辛亥革命并未解决这两大危机,一个重要的经验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由强有力的政党作为支撑性主体。

首先,在外争主权、内争政权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主题背景下,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中国现代国家走上了政党主导下的建构之路。不同于西方先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而后孕育出政党的模式,中国社会先孕育出政党,而后由政党

建立起现代国家,“最终走上了一条政党中心主义建国的道路”^[14]。中国同盟会虽然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其组织结构极为松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故而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主体颇为软弱。民国初年各政党均沦为军阀附庸,进行国民革命消灭军阀政治遂为社会改造的必然之举。其后孙中山先生对同盟会进行了一系列改组,直到1924年才仿照苏俄建立起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之改组即在厉行国民革命,树立革命之中心势力,造成我国政治上一个新的阶段。谋根本上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实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使政权统集于一个精密广博的党治之下”^{[20](P6)},力图强化政党力量来建构现代国家。与此同时,民国初年政治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政治纲领的确定,如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21](P404)}辛亥革命后并未迎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先进分子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继续探索,由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转而“以俄为师”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中共二大上,党明确提出了当前的政治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目标。可以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失败后政党对于如何建构现代国家、建构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继续探索与追寻,而“共和的出现为现代政党的全面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19](P4)},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终将由现代政党来主导。

其次,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支撑性主体,围绕现代国家建构展开了合作、博弈甚至武装斗争。国共两党都是以俄为师,仿照苏联政党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都以建构现代国家为自己的使命。只是“孙中山联俄以后,更增强和坚定了对‘以党建国’、

‘以党治国’和一党独掌政权的信念”^{[22](P21)}。在孙中山去世后,这种信念和趋向被蒋介石极化为“一党治国”,军政、训政、宪政的制度设计,并最终演变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1928年东北易帜后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是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实现主权独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浙江省预征钱粮激起各界反抗,“中国不能驱逐帝国主义,不能改善农民生活,有什么真正的建设事业可言?然而国民党所谓建设事业,却反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23](P264)}。由此揭示,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便不能建构起现代国家,更无真正的国家建设可言。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建构现代国家的任务极为艰巨。1943年南京国民政府部分地收回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但是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民族独立、基础性权力发达、中央集权、政治民主并未真正实现,建构现代国家的任务远未完成。国共两党根本利益的分野决定了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迥异,抗战结束后两党从合作走向战争,最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支撑性主体。

第三,中国共产党不断汲取辛亥革命经验教训,逐渐成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主体。政治斗争的胜负固然是军事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借鉴、吸收辛亥革命的成败经验,制定妥善的革命斗争战略与策略,逐步探索出适宜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建构之路。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识到广泛的土地革命和广泛的民众动员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24](P16)}。此后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作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内容,在各革命时期,注意以解决土地问题来调动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把农民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动力来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谈到战争与战略问题,认为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爱兵如命是“都

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而没有军队的小党“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这一认识使得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进而为建构现代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力支撑。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思考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年以来奋斗的目标,“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5](P663)},并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向和制度设计,初步描绘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蓝图。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辛亥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并非因为人多没有解决吃饭问题,根源在于“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15](P1511-1512)},现代国家的建构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取得民族独立、争得人民主权地位。所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汲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发动和依靠农民、掌握革命领导权、坚持党的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举等方面形成一系列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逐渐成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支撑性主体,探索出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之路。

第四,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建构起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几个较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他们虽然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在中国走“中间道路”,实质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没有现实土壤,国民党迫害爱国民主人士、解散民盟等事件,标志着民主党派以和平斗争方式建构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此后各民主党派必然在国共两党之间“选边站”,形成一种新型政党合作关系。随着解放战争顺利进展和国共军事政治局势反转,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越

来越趋向于形成一个政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格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哪一方居于权力的领导核心,这是一个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格局,而非政治结构的选择。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诚邀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建国,得到民主党派积极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党制度框架,绘制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蓝图。

三、发展逻辑:长时段下中国共产党汲取孙中山思想资源开辟现代国家建设新格局

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建设往往是同步过程,但只有建立起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民族建设才能被纳入现代国家发展轨道,从而获得稳定持续的制度化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以中华民族为族体形成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疆域具有一致性,中华民族即具有国族的政治意涵。中国现代国家巩固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化,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步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传统民族建设理论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政治统一的建设,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在建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制的同时,使国民完成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从对君主和神权的忠诚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文化统一性的建设,即通过制度、政策和教育宣传等促成国内文化的同一化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从而实现民族的‘同质化’”^[26]。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基础上建立起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必须在维护独立的主权国家前提下,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凝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国家认同,三者奠定民族建设与国家发展同构互

持的政治框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从孙中山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与振兴中华的未竟的事业,到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独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彰显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信”的“义务共同体”^{[27](P23)}的历史连续性,以及在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上的目标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28],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继承革命先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借鉴孙中山“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21](P112)},汲取新三民主义思想资源和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的探索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强大国防保障主权国家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以文化内聚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共产党汲取孙中山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以强大国防实力保障中国现代国家的主权独立。现代国家的独立以民族解放运动为前提,但是“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等同于成功的民族国家的建设,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仅需要民族热情,还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29]。确保独立的国家主权须取得外交承认意义上的国际独立地位,具备强大的经济、国防实力。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不具备捍卫国家主权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孙中山为争取其他主权国家的外交认可,在武昌起义后数日内发表《告各国书》,宣布“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前与各国所有之条约,皆作为有效”“于我军未起事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一概承认偿还,决无改议,将来以海关税款抵赔”^{[30](P545)},不惜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为代价,试图换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承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抵达纽约会

见日本大使,计划由伦敦转赴欧洲德国,再经印度洋去日本,“意在取得协助”^{[30](P544)}。弱国无外交,孙中山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向联合苏俄,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P628)},这一立场转变对国共合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确定了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15](P44)}。进而,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31](P55)}。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制定了“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等外交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并且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唯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方能捍卫独立自主地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国家工业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工作,坚持必须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31](P180)}。强大的国家工业建设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捍卫了主权国家地位,这是顺利开展国家建设的必要前提。

第二,中国共产党汲取孙中山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国情出发进行统一的政治建设,建构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以中华民族整体进步为主体,以民主政治建设为主要内容。但是民主政治总是以具体的社会制度为依托,是一国特定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产物。孙中山效法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以欧美民主政治为样板,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但无论总统制抑或责任内阁制都未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此后孙中山发展了三民主义,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主张彼时应将“国民党之民权主义”,扩大至“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25](P648)}。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所吸纳,毛

泽东提出“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32](P1056)}。具体来说,这种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15](P1478)}。以此为考量,毛泽东在考虑新中国的政体时认为,议会制已经被“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33](P135-136)}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中国现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所确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社会发展基础,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和凝聚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内在规定性,使其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34]。为保障各民族的平等进步与政治民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周恩来指出,“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35](P373-374)}。民族自治机关具有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和地方行政机关双重职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保证了民族地区的民主和自治权利。

第三,中国共产党汲取孙中山民族思想的经验教训,重视以统一的文化建设,培育起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为现代国家巩固与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这正是“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本质性区别之一”^[36]。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长期的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7],文化潜在地发挥着整合共融作用。对于中国现代国家而言,以统一的文化推动民族现代化和民族整体化进步,形成一体化国族认同,是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孙中山也极为重视民族认同的构建,以“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纲领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工具。但是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狭隘的民族思想弱点显现，如孙中山所言“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中华民国建立时以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孙中山设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和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38](P187-188)}，努力建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则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痛斥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错误思想和政策，“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所以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救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32](P1084)}。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31](P789)}被写进《共同纲领》，在法律意义上赋予各民族平等地位。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统一文化标识，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和国徽。国旗、国歌和国徽集中反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革命和思想文化，成为现代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国族认同的精神符号。并统一语言文字和教材，注重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培养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以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公民的家国观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作为各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共同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上的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现代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聚合资源。

四、结语

中国现代国家的孕育肇始于近代以来中华帝国体系的崩塌，历经中华民国时期的曲折探

索，直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构，才取得实质性突破。回溯这一历程，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正如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的条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2](P470-471)}。在此意义上，短时段视野下辛亥革命的发生回应了建构现代国家对统一与现代化目标、支撑性主体及革命方式的选择，因而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主题下的必然事件。中时段视野下辛亥革命奠定了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路径，中国共产党从中汲取了一系列启示和借鉴成功建构起现代国家。长时段视野下中国共产党借鉴孙中山的思想资源，继承民族复兴伟业和艰苦奋斗精神，探索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全新路径。

以辛亥革命视角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可知悉以下演进逻辑。第一，实现国家统一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国人的共同理想，但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建构一个主权独立、界限清晰、中央集权、政治民主的现代国家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前提和唯一出路。第二，这一历史进程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肩负着天下苍生命运和近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转化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构建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格局，探索出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现代国家建构之路。第三，中国现代国家巩固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与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汲取孙中山的思想资源，将国家主权的维护、统一的政治制度建设、统一的文化认同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开创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新格局。在政治实践中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置于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总任务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从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互促,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为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里的内在逻辑统一。

现代性是民族和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议题。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必然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和国家现代性,两者是统一互构的历史过程。质言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蕴着中华民族一体化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建设,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生共长,探索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民族国家发展路径,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的坚强力量,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28]。中国现代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正处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此,通过辛亥革命纪念与历史回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巩固中国现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汲取智慧、传承精神、凝聚力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现代国家“正在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形式”^{[7](P192)},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构和发展之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资源。

参考文献:

- [1]周平.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 [2]任剑涛. 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J]. 学海, 2014(2): 76-94.
- [3]邹诗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J]. 文史哲, 2016(1): 157-164, 168.
- [4]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初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5]李席. “大历史”与“整体史”——黄仁宇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问题[J]. 学术探索, 2008(3): 86-91.
- [6]李金铮. 整体史: 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J]. 近代史研究, 2012(5): 24-28.
- [7][英]安东尼·吉登斯.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吉登斯讲演录[M]. 郭忠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8]郭世佑.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J]. 炎黄春秋, 2014(5): 35-40.
- [9]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 [10][美]斯蒂芬·哈尔西. 追寻富强: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1850—1949[M]. 赵莹,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11][美]韦慕庭.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M]. 杨慎之, 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
- [12][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王磊, 王跃. 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J]. 江苏社会科学, 2017(6): 152-158.
- [15]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6]龚书铎, 吴效马. 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J]. 求是, 1996(6): 38-41.
- [17]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8]郑大华.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J]. 史学月刊, 2020(8): 5-8.
- [19]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 [20]杨幼炯. 中国政党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社, 1984.

[21]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2]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23]恽代英全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4]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5]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6]王希恩.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建设实践及理论创新[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2): 5-10.

[27][英]戴维·米勒. 论民族性[M]. 刘曙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28]习近平.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10-10(02).

[29]张淑娟. 关于民族国家的几点思考[J]. 广西民族研究, 2009(4): 29-36.

[30]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26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2]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3]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张淑娟, 梁秋瑞. 历史方位与培育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与方向[J]. 广西民族研究, 2021(1): 39-46.

[3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6]周平. 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J]. 思想战线, 2019, 45(1): 56-65.

[37]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 中国民族, 2019(4): 80.

[38]孙中山全集: 第五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责任编辑 邱佛梅】

The Logic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S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History

ZHANG Zonglan & LIANG Dawei

Abstract: Modernization has been the relentless goal pursued by all social classes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must be fundamentally premi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a modern state. Examining the occurrence and profound impact of the 1911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olistic historical view reveals the logic underly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In the short-term,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aved the way for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nurtured supporting agents, laid a social foundation, and responded to the historical theme of building a modern state. In the medium-ter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replaced the Kuomintang as the supporting agent and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the long-term, by incorporating Sun Yat-sen's ideological resources, the CPC has prioritized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fie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ostering of a unified cultural identity as fundamental aspects of modern state-building, thereby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The process of the CPC absorb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listic view of history reflects the internal logical unity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country led by the CPC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ite all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listic view of history; the revolution of 1911; modern nation-state; nation building